

■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参考丛书 ■

丛书主编：俞可平 王伟光 李慎明

NONGYE DE ZHENGZHI JINGJI FENXI

农业的 政治经济分析

主编：何增科 周 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 何增科, 周凡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参考丛书)

ISBN 978-7-5366-9307-4

I. 农… II. ①何…②周… III. 农业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分析 IV. F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9124 号

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NONGYE DE ZHENGZHI JINGJI FENXI

何增科 周 凡 主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杨亚平

责任校对: 周玉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俊棚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 mm 1/16 印张: 28.5 字数: 400 千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册

ISBN 978-7-5366-9307-4

定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参考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丛 书 主 编：俞可平 王伟光 李慎明
丛书编委会：俞可平 李慎明 王伟光 顾海良
 黄楠森 靳辉明 李崇富 徐崇温
 卫兴华 许征帆 庄福龄 夏伟东
 杨金海 王学东 何增科 钟哲明
 罗文东 梁言顺 杨雪冬
主 编：何增科 周 凡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参考丛书》总序

无论是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看,还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命题和现实主张,构成了人类思想的一个“磁场”,吸引了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自不必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也难以回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 19 世纪所提出的重要命题。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思想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还形成了一门所谓的“马克思学”。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纷纷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同流派。应当说,除了那些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粗暴的谩骂、攻击、指责之外,所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即使其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与我们迥然不同,也都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更加全面地认清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因而,编选一套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研究参考丛书,力求反映各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上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对于推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正是这样一套集国内外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研究方面若干代表性成果的资料性丛书。

从直接的目的来说,编选这套丛书,也是为了完成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规定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努力分清“四个哪些”,即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在编选时,我们遵循这样几个原则:

第一,紧密围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如民主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阶级问题等等。

第二,尽可能地选择在相关问题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哪怕它们不是当代的而是前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公开发表的成果。

第三,以编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为主,即《丛书》的主体将是国内外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原著。事实上,这套丛书是以中央理论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的相关研究主题来组织编选的,由各子课题的首席专家作为每卷的主编。我们充分尊重各位首席专家的意见,主要由各卷主编来确定选题的范围和具体的内容。

感谢各位首席专家和各子课题主要成员为编选这套丛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感谢重庆出版集团为顺利推出丛书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希望本丛书的出版不仅对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也有所贡献。

俞可平 2007年9月26日晚于方圆阁



导 论

激进政治视域中的农业与农民问题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周 凡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农业问题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域之外,或者顶多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偶尔论及的细枝末节。好像把马克思主义与农业问题联系在一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或者被人视为纯粹出于迎合当下“三农”问题之需要而凭空杜撰出来的。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识。仔细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农业与农民问题一开始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并且是一直伴随着他们对资本的批判和对革命规划及未来社会的构想的重要因素。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他们都留下了大量的论述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极有价值的文本。今天,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关于农业与农民问题的许多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全面、深刻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恰当地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理论和农民理论,对于我们科学地分析农业和农民问题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无不具有极其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

—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先创造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然后才延伸到农业与农民问题,也不是为了解释他们的主要学说而附带性地涉及到农业与农民问题。他们关于农业与农民问题的阐述本身就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甚至可以说,如果疏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至终对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与论述,我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何以会把当时工业不发达、农业人口占多数的落后的德国看成是“更加肥沃的革命土壤”。我们也无法真正地把握他们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对激进政治规划的总体构想,以及他们作为革命的参与者与推动者的具体策略性的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之所以能从黑格尔唯心主义摆脱出来,之所以最终能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辩证唯物论者,这都跟他们把农业与工业联系起来、把工人与农民联系起来进行总体性的辩证的考察有着很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转向现实、干预社会生活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最初遇到的两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及“摩塞尔农民问题”。

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所涉及到的实质问题就是工业与农业、资本家和有产者对贫苦农民的剥夺问题。在当时的德国,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投资者占有公社土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土地的减少或失去土地的现象日益加剧,这导致了贫苦农民频频盗窃林木和违禁狩猎,普鲁士政府对农民的盗采与偷猎的惩罚愈发严厉。1836年,在普鲁士因此类行为而受罚的人就达15万之众,占整个刑事案件的77%。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仍觉得需要进一步采取打压措施,为此,“马克思第一次挺身而出捍卫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①写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摩塞尔河沿岸农民的贫困问题。《莱茵报》在1842年12月10日、12日、14日发表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写的三篇描述摩塞尔农民悲惨境遇的通讯,批判政府对农民的困苦以及对农民控诉的不理睬,从而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把两篇反驳文章交给《莱茵报》编辑部,这两篇官方文章指责《莱茵报》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17页。

唆摩塞尔农民反对政府,煽动人民的不满情绪,妄图削弱当局与臣民的联系。由于记者无力十分深刻而全面地论证他文章里的论点,从而驳倒沙培尔对他的指责,于是,马克思就亲自担当起这个任务,以摩塞尔记者的名义写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对反动政府的责难进行了有力地驳斥。多年后,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①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最初并不是由对工人阶级的关注转向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正好相反,他是由农民问题开始而进展到对工人问题的研究的。对农业与农民问题的研究是引发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因之一。

我们注意到,在第三篇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在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唯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时^②,并没有使用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这种称呼,他用的是“贫民”和“贫民阶级”这样的术语。在为“贫民阶级”自然权利辩护时,马克思这样写道:“贫民在自己的活动中发现了自己的权利。人类社会的自然阶级在拾集活动中接触到自然界自然的产物,并把它们加以处理……在贫民阶级的这些习惯中存在着本能的权利感,这些习惯的根源是肯定的和合法的,而习惯权利的形式在这里更是自然的,因为贫民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还没有在被有意地划分了的国家里找到应有的地位。”^③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贫民指什么人?贫民阶级指的是哪一个阶级?这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之所以值得一问,是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对贫苦农民的自然权利被剥夺的描述也完全可以应用于工人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1~1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7页。

或无产阶级身上。马克思也完全可以说,工人阶级的存在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并且,这种习惯还没有在被有意地划分了的国家里找到应有的地位!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1843)一文中,马克思论述的对象分明是摩塞尔沿岸地区的农民,但他却很少再用“贫民”和“贫民阶级”这样的表达,而是径直使用更加笼统和宽泛的“人民”一词。

恩格斯在马克思写作《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的第二年所写的杰出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中,在引述了自由党的一位议员的话“英国农民(即农业短工)和英国贫民这两个词是同义词”后指出,“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国农业区的大部分短工来说,这个描述也还是正确的”^①,正是农业区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展而益发贫困,很多农业短工过着完全赤贫和半赤贫的困苦生活,所以恩格斯愿意将这样的农民称之为“农业无产阶级”,并专辟一章来论述这一“阶级”。无独有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提到了与马克思同样的论题——农民违反狩猎法盗猎问题:“尽管农村的生活条件——住处分散、环境安定、职业固定,因而思想也就保守——对任何发展都很不利,贫穷和匮乏还是产生了自己的结果。”^②

恩格斯虽然把以个别人犯法的行为来直接反抗称为反抗的“第一阶级”,但他还是把这种付出昂贵代价而作出的叛逆行为之促发因素——“贫困和压迫”称之为“伟大的动力”。一如奥斯卡·哈曼指出的那样,“从理论的观点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认为,农民、佃农和农业工人都与无产阶级一样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的剥削,即使是以一种更加不明显的、不直接的和非大众化的方式。”^③这一点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的宏大革命抱负和激进目标的构想是至关重要的,它实际上构成了他们关于落后的、工业化水平极低的德国将拥有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51~5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54页。

③ Oscar J. Hammen; 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3, Jun., 1972, p683.

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变革这一论断的重要基础。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的普遍的贫困,使得农民向彻底无产者的转化变得可能,变得快速。马克思比谁都更清楚,德国(其实法国也是)占绝大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因此,农民能否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奥斯卡·哈曼在《马克思与农民问题》这篇长文中,试图通过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问题的一贯重视来动摇一个几乎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正统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只能由无产阶级这个“掘墓人”去埋葬资本主义。坚持这种“正统”的人当然会把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看做是一种“历史的反讽”,看做是对“马克思进行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扭转”。这正是第二国际所有修正主义者和“正统派”持有的主张。哈曼运用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力图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是死守他们自己的表面结论,在不失最终目标的前提下,他们“准备支持任何一场革命运动,只要这些革命运动有望消除各种各样的路障”,“准备认同各种各样的群体的苦情——工人、农民、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是宗教的,只要这些群体有望推进‘运动’”^①。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是理论分析家,同时又是革命的实践家,但他们从来不以武断的理论教条把实践牢牢地封死,而是寻求二者的辩证式结合,当理论与实践出现紧张关系之时,他们更注重的是实践方面。因此,他们一直大力强调要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策略性的调整。

哈曼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表现出在策略的灵活性方面的天才能力,“他们一再地显示出这种能力,而且正是这种能力使他们在不丧失最终目标的条件下能够在各种各样的革命中发挥作用。然而,如果缺失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对实际革命的参加以及他们进行策略性调整的能力的考虑,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道路的任何

^① Oscar J. Hammen; 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3, Jun., 1972, pp. 679 - 680.

评价都将是现实的、片面的。”^① 在哈曼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性调适和对战术的强调非但不是对他们理论地位的一种贬低,反而恰恰凸显了他们的理论假定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为了推动对现存体制的破坏而推荐和实践各种方式的背离,恰恰是因为他们坚信,他们的理论结论是没有错的,坚信他们是顺历史潮流而动。”^②

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普遍处于低潮的当代境遇之下,许多人开始从各种层面、各种角度,质疑在落后国家是否应该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是否能够在一国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重大问题;而且,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高歌猛进,所向披靡,“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告别革命”之声不绝于耳。此时此际,读解哈曼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与农民问题》一文,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其一,哈曼想让人记住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动摇或削弱资本主义制度之基础的革命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是最坚定的、毫不妥协的共产主义者。这就等于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推翻资本主义之不妥协的信念恰恰是建立在对其他各种反对现存体制的运动的运动的最大“妥协”的基础之上的。

其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从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运动出发,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伟大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资本主义会机械式地“自动崩溃”。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这个必然性并不是资本主义自动给出的,实际上,就像马克思说的,只要这个制度还能容纳生产的进步与发展,它就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并且落后的体制会借助于武力以外的意识形态伪装来麻痹被统治者,因此,这个“必然性”不是静态的必然性,不是等来的必然性,不是资本家自愿送出来的

^① Oscar J. Hammen; 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3, Jun., 1972, p681.

^② Oscar J. Hammen; 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3, Jun., 1972, p680.

必然性,而是动态的必然性,创造出来的必然性,是由革命行动构建出来的必然性。胜利只来自于斗争。

当然,哈曼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与农民问题的缜密考察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民理论,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小农经济要被大生产取代以及农民本身具有“保守性”的观点,来片面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认为农民是“反动的”、“非革命的”力量,因此,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未来社会形态中,农民以及农民的生产经济方式应该也必然要成为历史的遗迹。通过阅读哈曼的文章,庶几可以使人们扭转这一思维定势,清除掉附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名下的“不实之辞”。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不惜与“魔鬼结盟”^①,那么,他们更不会拒绝无法逃避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农民阶层渗入到共同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运动中来。

必须明确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政治立场的把握从来就是客观的、辩证的、全面的,一方面他们对农民的依附性、被动性、保守性、分散性、狭隘性有足够充分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认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完全依赖于工业无产阶级的主动性,在这一点上,农民甚至更加厉害”^②;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信,由于农民和工人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同样是资本家攫取利润的牺牲品,“农民阶级在现存体制中不可避免地衰落”,因此,农民与工人的共同行为具有更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不断地转向农业和农民问题,“它包含着由农村人口所经历的大量苦情和期待,从而希望来自农村的这些不满在有着更高级的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的引导下,能够被动员为革命”^③。由于这两方面的认识的共同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

① Oscar J. Hammen; 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3, Jun., 1972, p685。

② Oscar J. Hammen; 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3, Jun., 1972, p686。

③ Oscar J. Hammen; 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3, Jun., 1972, p683。

对农民的态度可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因如此，哈曼才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于劝说农民参与革命总是表现为一个没有希望的任务，并且实际上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但他们对创立工农联盟的策略模式的坚持从没有放弃过。“要创造革命联盟，更为实际的方法就是要求共产主义者们能够通过农民的眼光来看世界。共产主义者不得不通过认同农民的各种要求、希望和痛苦来赢得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认识到走到田间去的价值”^①。

哈曼致力于提供一个展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农业与农民问题的策略性重视的细腻而翔实的历史性画卷，但文章的重心放在直至1850年的早期阶段。原因在于：“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策略性考虑更加明显，因为当时就面临着实际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之后紧接着的就是他们对这些革命的失败的反思和将要发生的早期革命的期待。”^②从哈曼的条理清晰的论述中，人们可以对许多原先没有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或被人们忽略了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珍贵文献加以重新地考量。比如1846年的《反克利盖的通告》、1848年的《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在总共17条要求中关于农民的要求就有4条）、1846—1849年间《新莱茵报》和《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上关于农业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文章、《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等等。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对待农民的策略上，哈曼特意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严厉批判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海尔曼·克利盖，这个最初由恩格斯推荐给马克思的有潜力的“新革命者”；另一个是时任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的安德列阿斯·哥特沙克。前者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成是共产主义的本质内容；后者则明确反对与农民结盟，主张建立纯粹的“工人共和国”。很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抵制克利盖式的“形而上学夸大”，又揭露哥特沙克的宗派式的“左”倾对共产主义事业

^① Oscar J. Hammen; 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3, Jun., 1972, p685.

^② Oscar J. Hammen; 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3, Jun., 1972, p683.

的背离。与这两种机会主义截然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与农村人口建立联系的需要,始终没有忘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农村人口的困苦生活境况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的基础。”^①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乐于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论及法国农民的分散性时关于“一袋马铃薯”的说法——“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②,——作为证实马克思关于农民“反动性”的经典论述。其实,这是以偏概全地误读马克思。殊不知,正是在这同一部著作里,正是这一段落稍后的一段,马克思慎重地说道:“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为了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③这不是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对农民是区别对待的吗?这不是清楚地表明,农民并非总是或并不一定是“一袋马铃薯”吗?更为重要的是,小块土地所有制并不是天然地、内在就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进步与落后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它是否能促进社会的向前发展。就像马克思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因而作为小块土地所有者的“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④。但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这个一度起过进步的历史作用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剥削农民的借口,成为资本的炼金炉中的绝好材料。正是由于这一重要的变化,“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

① Oscar J. Hammen; 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3, Jun., 1972, p68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2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231~232页。

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①

无论如何,比之于农民对封建地主的依附性而言,农民对于资本家的依附性要小得多。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才对法国农民中广为流传的愤怒充满着希望。正如哈曼所言,“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抱怨法国农民(‘野蛮的种族’)和其他地区的农民的愚蠢,那么他们却从来没有在‘野蛮人’代表着大多数的时候,不承认农民和农民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因素。”^②根据农民这个不是阶级又不是阶级的特殊群体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及其与其他社会阶级,特别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关系来判定农民的历史作用,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民理论所遵循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会超历史、超社会地谈论农民的某种固有本性,更不会把农民在封建社会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完全不变地引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或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中。退一步讲,即便在封建社会,德国的农民不也像恩格斯在《德国的农民战争》中所说的那样,怀着“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的理想和计划并创造出了“极其辉煌的成果”吗^③?

为了让人更为准确地领略马克思对于农民问题的重视,以及对于农民在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革命中的历史作用的体认,哈曼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分析革命事件的典型文本中所说的更庄重也更强调的话:“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④如果无产阶级已强大到凭借本阶级的力量就足以推翻资本的统治,无产阶级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页。

② Oscar J. Hammen; 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3, Jun., 1972, p694.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1~142页。

完全不必联合农民;如果农民阶级本身是个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阶级,无产阶级就不会去联合农民,而在马克思的时代,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无产阶级都还没有成长为二极对抗模式中的一极。因此,农民的“革命化”成为革命的关键要素。正如在当代,农民的“现代化”成为现代化的关键性要素一样。

二

尽管哈曼对1850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业与农民的观点与立场有所涉猎,比如,恩格斯在1870—1875年间出了新版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晚年所写的著名的《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欧地区农民运动的关注,特别是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村社的兴趣,等等,但哈曼对这方面的情况只是点到为止,一带而过,并没有展开深入的探讨,他的文章侧重于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主要是1850年前)关于欧洲农业与农民的理论。而提奥多·沙宁和春木棉的文章则致力于检视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农民问题的钻研。因此,可以把这两篇长文看做是对哈曼文章的补充,对哈曼工作的一种理论延伸。通过这三篇文章,我们基本上可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基本观点有一个概观式的通览。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农村村社的关注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他关于这方面的最初印象和反应并不是关于俄国的,而是关于大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一文中,面对印度古老的村社在大英帝国蒸汽机的轰鸣声中的崩溃,马克思这样写道:“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的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

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①显而易见,马克思感情的微漾很快就被理智所平伏,作为一个非道德论的唯物史观的创始人和倡导者,马克思在心里掠过一丝悲伤之后,迅速而坚决地把英国在印度犯下的“罪行”视做促进亚洲社会状况之根本改进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即便我们勉强同意提奥多·沙宁关于马克思把目光投向东方社会乃是他不满足于单一进化论图式而寻求进步性的社会形态与非历史的社会形态的全球共存的结果,有一点是不容妥协的,即此时的马克思仍然没有摒弃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主导理智模式的进化论内核,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坚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的未来的景象”^②,即是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球统一要素而到来,把东方社会的非历史的、无创新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强行拖入历史进步的轨道和进化规律显现它的力量的普遍性之中。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农村公社的各种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广泛的研究,得出这些公社所有制关系必然解体的结论,“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③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并没有给予俄国村社以太多的注意,他在许多地方提到过斯拉夫所有制,但几乎没有专门提及俄国的村社所有制,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此时依然认为俄国的村社与古代日耳曼的村社没有大的不同,“赫尔岑有关俄国农村村社为斯拉夫世界所独有的这样一种观点,被那时的马克思看做是纯属可笑的。马克思认为它在任何地方都找得到,而且与已经在西欧瓦解了的东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48~1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7页。